

文学回忆录

〔俄〕柯罗连科著

丰一吟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据 В.Г.КОРОЛЕНКО: “СОБРА-
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ТОМ ВОСЬ-
М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
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
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5)译出

文学回忆录

Wenxue Huiyilu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249,000 开本850×1168毫米¹/₃₂ 印张11¹/₄ 插页3

1985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700

书号 18019·3885

定价 2.30元

目 次

纪念别林斯基	1
关于格列布·伊万诺维奇·乌斯宾斯基	7
回忆车尔尼雪夫斯基	49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褫夺公权刑	87
安东·帕夫洛维奇·契诃夫	94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112
列·尼·托尔斯泰	139
伟大的巡礼者	146
和托尔斯泰谈话 最高纲领主义和国家组织	162
死了	169
安格尔·伊万诺维奇·波格丹诺维奇	171
伟大幽默家的悲剧	186
弗谢沃洛德·米哈伊洛维奇·迦尔洵	259
冈察洛夫和“青年一代”	298
第三种分子	313
论谢德林	334
译后记	343

纪念别林斯基*

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逝世以后，到这个月已经整整五十年了。自从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他的智慧熄灭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了。他的心是最敏感的，他的智慧是最灵敏、活跃而炽烈的。他曾经热情、痛苦而真挚地探求真理，从来不惧怕抛弃他认为谬误的见解而重又走向新的探索之路。半个世纪了！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比人的平均寿命还要长些。与别林斯基在同一时代生活并思考过的人，留下来的太少了！许许多多在他逝世那年诞生的人，也已经离开了生活的舞台！人的整整一生，整整的一代人，许许多多的生命，仿佛是一个生物层，横亘在别林斯基的最后一息和此时此刻之间。现在，由于这个纪念日的关系，他的形象在我们的记忆里复活了，而且复活得那么清晰鲜明，仿佛我们和他之间毫无隔阂，仿佛他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不停地追求，热情奔放，争论，驳斥，正象在他的短暂的一生中那样。

是的，五十年是一段很长的时期。在别林斯基评论过的书籍之中，大部分我们早已不读了。有许多书只是因为经过他的评论，我们才知道的。说实话：他自己的一部分著作已经归属于

* 这篇文章是一八九八年为纪念别林斯基逝世五十周年而作的。第一次发表在《俄国财富》杂志一八九八年第五期。柯罗连科把它编入马尔克斯出版的《柯罗连科全集》中已经准备付印的第十卷里，结果这一卷没有出版。

文学史的领域了，他的作品本来主要是为广大群众写的，然而其中许多篇幅，广大群众越来越少读，较常去触碰这些书的倒是专门历史家。然而，正是这五十年明显地表现出：对别林斯基的全部著作来说，是不存在一般的所谓死亡的。其中一部分著作将永垂不朽，正象经过这些著作的论述、解释而得以永远阐明了的那些作品一样。“不，我不会整个儿都死去，”^①别林斯基可以跟伟大的诗人一起说这句话。只要俄罗斯语言的声音不停息，每一代新的人都将重新一次次地与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的名字一同听到维萨里昂·别林斯基的名字，而且将反复阅读他的具有先见之明的作品。

但是，除了这位作家在后代人心目中的这种形式的死后生活之外，除了他的著作全部或部分在印刷机上重印之外，还有其他形式的死后生活。我们所指的并非这样的情况：在每一部新的文学作品里，在每一篇生动的文章、诗歌、小说和哲学论文里，在我们称之为自己的文学的整个多声部合唱中，重新鸣响着早已缄默了的声音，复活着从前思考并写作过的“惟上帝知其名”的人们的早已熄灭了的思想。这种情形我们仍然称之为死亡。要知道，就是在每一座坟墓上，也会长出新的生命来——在花朵的芬芳之气中，在野草的袅娜姿态里，在坟树的茂叶的絮语声中，我们都可以感觉到生命的气息；这生命在坟土下腐烂了，已经消融得没有个性了，但是在总的永不停留的生命激流中还留有痕迹。

别林斯基在我们看来却依然活着，他将永远活下去，而且不单是过着这种没有个性的生活。他在短暂的一生中运用过的那许多思想，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子孙都将要运用到，运用的时候甚

① 普希金的诗《纪念碑》中的一句。

至并不经常联系到它们的本源。而除了这些思想，除了那么多印出来的卷集和篇章之外，别林斯基还遗留给我们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形象，这形象将和最有天才的诗人们的杰作一同永远流传下来。

这个形象就是他自己，包括他对真理的热烈的渴望，以及他的探索和真挚。

真挚是别林斯基的主要特征，而且他达到了真挚二字的最完善最深刻的含义。记得波米亚洛夫斯基^①曾经这样问：你们知道真挚是什么？当一个人不仅对别人、甚至对自己都不会有一丝欺骗的时候，他的这种特性就是真挚。我们是多么希望把握真理——把握全部的真理，拥有它。我们是如此高兴拥有全部真理，甚至愿意作很大的牺牲，但求不丧失自己的信心——有时甚至只是信心的幻影。往往有这样的事，一个人向自己和别人断言他拥有真理，其实真理早已由于暧昧的怀疑而在他心中腐蚀了，这正象有时神明早已离开祭坛，而我们却继续在祭坛面前焚香，或者，神明从来不曾到过那些祭坛，而我们却在那里焚起香来。不，思想家和作家的真挚应该是这样：敏锐地倾听那种声音，倾听那种即使是最微弱、最胆怯的怀疑的声音，不是在心灵阴暗的角落里把它压低，而是把它从心灵深处唤到意识的光辉里来，倾听它，象倾听婴儿的微弱的啾啾声一样，——也许从婴儿的嘴里很快就会说出新真理的坚强声音来，——不泰然自若、故步自封，直到头脑里连怀疑的影子也已不复存在，已经被制服而消失掉，让新真理接替了老真理的位置。

① 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波米亚洛夫斯基(1835—1863)，民主主义作家，《神学校随笔》的作者，该书暴露了当时生活中最黑暗的方面之一，是反对农奴制俄国的全部社会制度的愤怒抗议。

“狂暴的维萨里昂”(朋友们都这样称呼他)对我们说来将永远是这种真挚的最好的体现。他毕生燃烧着这种渴望,他的整个生命就是对这种纯洁的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这种追求完全不受违心或自欺的阴影的蒙蔽。当他认为找到了真理的时候,他比任何人更炽烈地充满着深信的狂喜,当怀疑出现的时候,他比所有的同年人更深切地感到痛苦。然而,他比任何人更情愿抛弃在他看来已不再是真理的东西。也许,他正是因此而早逝的吧。某诗人的这两句悲痛的呼号,对于他,比对于任何人都合适:

作家兄弟们,你们的命运中

具有注定的劫运……①

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生命由于射击的偶然命中而断送了,皮萨列夫淹死了,波米亚洛夫斯基、列维托夫以及大多数别的作家都因痼疾而减促了自己的寿命,果戈理早就把这种痼疾称之为“天才人物的痼疾”……许许多多的原因把这种在一般结论中被称为俄罗斯作家的“劫运”的现象复杂化了。只有在别林斯基的生命里,这种现象出现在纯粹的状态中,出现在一点也不模糊、丝毫没有复杂化的精神斗争的状态中:他的神经在周围的黑暗中熊熊地燃烧,——单是这种熊熊的燃烧就足以说明“为什么他死得这样早”②。这是真正的精神斗士,没有恐惧和非难,俄罗斯文学将永远骄傲地注视着他,象注视自己的功臣和圣者一样!

① 引自涅克拉索夫的诗《在病院里》,原文是“……我们的命运中……”。

② 涅克拉索夫的诗《玛霞》中的一句。

而这一点可能就是别林斯基留给我们的最不朽的部分。诗歌给予我们各种理想的形象，但我们不能忘记：真正的堂·卡罗斯^①只是一个堕落家庭里的意志薄弱的子孙，侯爵波扎只是席勒想象中的人物，真正的马利·斯图亚特^②的生和死都和这不朽的剧本所描写的完全不同。然而，别林斯基的纯净的形象，却已经是任何最吹毛求疵的历史批评所不能破坏的了。他实际上正是这个样子，而且在他的著作、书简和行为中表现出来的他的生活，也足以和最理想的虚构之作相比拟，足以和充分现实性的毋庸置疑的优点相比拟。

大约在二十五年以前，涅克拉索夫渴望有这么一个时代，那时候，人民

从市场购买的
不是严厉的将军的画片，
不是愚蠢的贵族，
而是别林斯基和果戈理。^③

从那时候起几乎已经过了三十年，在这期间，俄罗斯的进步过程是缓慢而不平稳的，到了我们现在，离开这个时代也还远呢。报纸上固然常常有所报导，说这个城市或那个城市里的议会或文化团体准备举行这位伟大的俄罗斯批评家的纪念会。在萨拉托夫是由文学艺术协会发起的，在萨马拉则由议会主办；当读者读到这几行文字的时候，在别林斯基的故乡奔萨，一定会有

① 席勒的剧本《堂·卡罗斯，西班牙王子》里的人物。

② 一五四二至一五六七年间的苏格兰女王。

③ 这是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第二章里的几句，第二行原来是这样的：“不是布鲁塞尔的画片……”

许多知识分子集会纪念别林斯基。但是，人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名字至多只是通过遥远而模糊的回声传达到人民那里而已。别林斯基逝世后不久，千百万俄罗斯人民获得了自由和法律上的平等（尽管是理论上的）。要达到消灭教育上的极大不平等的历史阶段，那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别林斯基相信这种不平等终于是要消灭的。对于我们来说，这已经不仅是相信，而是确信——这种确信可以在虽然缓和却很明显的社会运动方向中得到证实。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无疑地，涅克拉索夫的理想也会实现了，因为不管实现这理想需要多少时间，别林斯基的形象是永远不会暗淡下去的。他经受了自已的考验时期而竟然没有腐朽，现在正在期待着向他延伸过一条路径来，而且这条

人民的路径将不会荒芜。^①

一八九八年

^① 普希金的诗《纪念碑》里的一句。

关于格列布·伊万诺维奇 乌斯宾斯基*

——一个人回忆中的面貌

有些人，好象钱币，被铸造得一
模一样。另一些人，好象奖牌，是为
了特定的场合才铸造出来的。

霍夫曼

格列布·伊万诺维奇·乌斯宾斯基就是这样的奖牌。他是一个独特的人，不象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象他。这是人类的稀世之宝，是罕见的美和罕见的美德的珍贵产物。

我们不得不痛心地承认，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真实人格，和我们根据他们的作品而形成的那种观念，是很少相符的。我们创造思想、声音和形象的时候，往往站在比我们的寻常人格高一些的地方。我们仿佛走进了和我们的日常生活隔绝的山上的

*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一九〇二年（乌斯宾斯基逝世以后）《俄国财富》杂志第五期上。一九〇八年作者在文体上稍加修饰后，把它收入《逝去的人》一书中，以后又收入一九一四年马尔克斯出版的《柯罗连科全集》第一卷中。

小礼拜堂里。然后，“当阿波罗还没有向诗人要求庄严的牺牲的时候”^①，我们又从这些山峰上走下来。这些山峰不论高低如何，总是我们人格的最高点。有时，这个寻常的水平离开山峰非常远。正因为如此，和作家见面时的第一个印象往往就会微微使人感到失望，我们很难把我们想象中的观念和真实的人格联结成一个整体。

但是往往也有可贵而难得的例外，那时候这两种观念完全相符而不可分割。格列布·伊万诺维奇·乌斯宾斯基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外。

八十年代下半期，我住在下诺夫戈罗德。在我接近的友人们中间，有一位当地的作家。他当时负责伏尔加河沿岸一份报纸的文学部门。凡是在那个混乱晦暗的时期里已经过着有觉悟的生活的人，一定都还记得当时的风尚的一般调子。在所谓知识分子方面，对“小兄弟”^②展开了一场大争论（不过后者对于这场争论竟照例一无所知）。虽然乌斯宾斯基从来没有把农民理想化，相反的，他甚至在知识分子最向往于“人民真理”的“基础”和秘密的时期，曾极其沉痛而有力地谈到“农民的卑鄙行为”和拉斯波亚索沃村的愚昧^③。虽然如此，在这时候他却竭尽他的伟大天才的全部力量，继续召唤社会注意人民生活的种种问题，注意这生活中的一切病态矛盾以及这生活同知识分子的心和思想的一切联系。所以人们在回过来反对农民的时候，也开始反对乌斯宾斯基，向他提出种种质问和责难，纷纷写信给他。当这种风尚刚刚开始的时候，乌斯宾斯基曾经在发表于《祖国纪事》的一篇文章里十分俏皮地指出并驳斥这一情况。他用这样的

① 普希金的诗《诗人》中的一句。

② 当时知识分子对农民的称呼。

③ 见乌斯宾斯基的《支票簿》。

话来描述这种风尚：“我们也该有份。”实际上弄成什么样子啦：农民充满了全部文学作品。到处都描写农民，到处都描写人民。

“我们也要……我们也该有份”^①……无疑的，这种风尚自有其原因，这些原因也许绝不是没有根据的。有许多人从前曾经“也替自己”要求美、理想、鲜明色彩或关怀，但在不久以前，他们不但不再要求这些，甚至忘记了自己，把一切个人要求都让给小兄弟了。但是，生活和被辜负的期待把他们带进了死胡同，似乎没有出路了……于是他们就开始自我深造，自我提高，离开了一向权威地支配着人的头脑和心灵的社会问题，来解决孤立的个人问题。“在自身周围绕了八万俄里^②”，乌斯宾斯基照例确切地说明了这种风尚的一个方面。伤心失望的俄国知识分子陷入了沉思，进入了文化的隐修院，或者呢，对美学和形式的态度变得特别任性，赌气地要求“新的美”。

我的那个朋友也部分地感受到这种风尚。除此以外，他很熟悉外国文学，对俄国文学则一无所知。他当然完全没有看过乌斯宾斯基的著作，然而也怀着对乌斯宾斯基的成见，反对他的“还是要看看农民”的坚决号召。

有一次他走进我的客堂，当时，乌斯宾斯基刚刚来到下诺夫戈罗德，正和我的家人、朋友们一起围坐在茶桌边。乌斯宾斯基以他所惯用的语调谈论着什么，在这语调里流露出一种抑制的、深切的悲哀，有时，这悲哀突然让位给一种特殊的、乌斯宾斯基所固有的平静的幽默。我把我的朋友介绍给他。乌斯宾斯基站起来，和我的朋友握了握手，含糊地道了自己的姓氏，又继续谈

① 乌斯宾斯基的《不管愿意不愿意》发表在一八八四年《祖国纪事》第二期上。

② 1俄里合1.06公里。

论那使他感到兴趣的、已经引起听众注意的话题。我偶尔望了望我的朋友，发觉他脸上有聚精会神的神态，同时还夹杂着极端惊讶的表情。过了一刻钟，他从自己的位置上站起来，一面走进邻室，一面招呼我跟他去。

“您这位客人是谁？”他怀着极大的好奇心问我。“我没有听清楚他的姓氏。”

“怎么？您为什么用这样的语气问我？”

“这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他身上……才气横溢。”

“祝贺您，”我笑着回答，“您认识了格列布·伊万诺维奇·乌斯宾斯基。”

这一次以后，我的朋友一连几个星期专心一意地研究着乌斯宾斯基的著作，越来越心向神往，于是伏尔加河沿岸的报纸上就出现了乌斯宾斯基的这位新的热烈崇拜者的一些文章。他永远被征服了，而且不是乌斯宾斯基的作品引起了他对作家本人的兴趣，正相反，是作家本人非凡的感化力迫使这个怀疑论者去研究他的作品。

格列布·伊万诺维奇·乌斯宾斯基在自己的作品里，没有充分显示出自己的非凡人格和天才。在心中仔细酝酿出来的和从同类的艺术素材中提炼出来的单纯形象，比起乌斯宾斯基所用以写作的那种形象和政论的混合体来，往往更容易吸引人的注意，而且生存得更长久些。乌斯宾斯基所需要的不是美，不是印象的严整性，不是形象本身。他以狂热的激情，在古老的废墟中间为创造新的良心寻找材料，为新生活或者只是为了对生活作新的探索寻找定则。对于他认为他自己和读者所共知的东西，他不愿为它仔细加工，而只是草草地刻划一下，随便填满，但求不留空白就是。反之，对于还只是在前面闪现出未来真

理的模糊轮廓的东西，他却不等它自发地在心中形成明显独立的形象，就热情而急切地去追求了。他企图用首先想到的字句赶快把它描述出来，以满足当前历史瞬间的迫切需要。因此他常常重复叙述，不断地强调他所发现的思想，使读者跟他一起体会他的探索、他的失望以至全部准备工作。当建筑物的脚手架还没有拆除的时候，他就让居住者搬进去了。乌斯宾斯基所关心的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补偿了这一切，而作者和他的读者的情绪的共同性则填满了他的匆促写成的著作中的空白。现在，当人们的情绪改变了的时候，这些空白就明显起来，于是，整个说来，乌斯宾斯基的作品就变得“费解”了。但是，如果有人不怕脚手架，不怕大量著作中的显著的混乱，他将在这里发现带着无比杰出的天才痕迹的卓越形象，发现深刻的、简直是“满腔热情”的思想（例如在《土地的威力》^①这篇描写农民劳动的哲理著作和史诗中）……但是这一切之中特别有意义的，是作者的个性本身：它具有独特的深度，具有对良心问题的非凡的敏感，具有骚乱和痛楚……

凡是亲身认识乌斯宾斯基的人，凡是记得他在一切言行中、沉思的目光中、甚至在沉默中立刻显示出来的那种心灵基调的感化力和深刻含义的人，一定都能同意我那位朋友所作的评语：在这个独特的、出类拔萃的人物身上“才气横溢”……

二

我个人认识格列布·伊万诺维奇·乌斯宾斯基，是在一八

^① 乌斯宾斯基的一组特写的总称，首次刊登在《祖国纪事》杂志上（1882年第1，2，4期）。

八七年的三月或四月里。

在我生平的一段艰苦的时期里，乌斯宾斯基有几句话通过第三者或许是第四者辗转传达给我，他向我问候，并且赞许我的初期文学尝试^①。这位我所喜爱的作家对于我这个无名的、湮没在流放中的青年人如此关怀，以及他辗转托人向我致意的那种操心，深深地感动了我，并且在我心中留下了一种特殊的感激之情，不仅感激他这个作家，而且感激他这个人。我就怀着这样的感觉，登上瓦西里岛^②上一所大楼的五层楼上（好象是五层楼吧），那几年乌斯宾斯基就住在这里。那时，作家的肖像不象现在这么普遍，所以我对于乌斯宾斯基的外貌没有一点儿概念。我走进前室，隔壁那些挤满青年人的房间里有一人出来接待我。我记得，那天是他家的一个节日，屋子里又快乐又热闹。当时还感觉不到在不久以后就要向这个家庭袭来的风暴，青年们快乐逍遥，整个住宅都充满了喧哗嘈杂之声。我说出了自己的姓氏，几分钟之后就被一个人拥抱住了，这人我起先还来不及看清楚呢。直到他为了望望我的面部而向后退开一点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看到了他那对奇妙的眼睛，深邃的、分得很开的眼睛。这对眼睛流露出亲切的、同时又是悲哀的神情。我觉得他面有倦容。然而我记得，没有一点儿过渡的印象和不协调的现象，他的脸一下子就和读了他的作品后凝聚在我心中的一切精华融成一片了。我只是觉得，《岗亭》、《毁灭》^③和充满鲜明独特的幽默感的

① 指乌斯宾斯基对柯罗连科的短篇小说《奇女子》的评论。

② 彼得堡的地名，在涅瓦河西岸。

③ 《岗亭》是乌斯宾斯基的第一篇作品，刊登在《祖国纪事》杂志上（1868年第4期）；《毁灭》是乌斯宾斯基的小说集，内收三个中篇小说：《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的观感》（1868年）、《温顺谦恭》（1869年）、《一个懒汉的观感》（1871年）。

这许多画面的作者的脸庞和目光，还应该更愉快一点。但是我又觉得，如果这样的话，他的脸也不见得会比带着这种凝滞的、沉思的、又好象早就淤积在这个深刻心灵中的忧郁来得好些。

乌斯宾斯基匆匆地把我介绍给他家里的人以后，就带我走进靠大门左面的一间小小的工作室。他请我坐下，随后自己也坐下，抽起香烟来。起初我们两人都默默无言，不过我完全没有因为这种沉默而感到局促。正相反，从初见面的瞬间起，我就觉得同这个带着悲哀的眼神和亲切的微笑的人很亲近，好象我们早就认识了似的。他抽着烟，倾听着从邻室传来的青年们愉快的喧嚣声。当欢乐之声特别沸腾的时候，乌斯宾斯基突然容光焕发，用温柔的眼光望着我，仿佛在邀我参加这共同的欢乐。接着，他好象继续着早已开始的谈话，和我谈起他的孩子们、他们的性格，以及家庭庆祝的原因来。

这第一次谈话的细节，我不知怎的没有象我们以后的多次谈话那样记得清楚。我只记得，已经是在黄昏过半的时候了，我们谈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您喜欢他吗？”乌斯宾斯基问。

我回答说我不喜欢他，不过他的某些作品，例如《罪与罚》，我读了好几遍，感到极大的兴趣。

“读了好几遍吗？”乌斯宾斯基惊讶地追问我，接着，用他那沉思的目光注视着香烟的烟缕，说：

“我可不能……您知道……我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有时你坐在火车里……打起瞌睡来……突然觉得坐在你对面的那位先生……一个最普通的人……甚至相貌善良……但是突然他向你伸出一只手……简直……简直要来掐你的喉咙……或者对你干别的坏事……而你却一动也不能动。”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表情那么丰富，他那对大眼睛那么奕奕有神，竟使我仿佛由于受了他的提示也亲身感觉到了这噩梦的轻微侵袭，使我不得不同意：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时候，有时体验到的感觉和他的这番描述的确很接近。

“不过，终究还是有許多真理，”我这样反驳。

“真理？……”

乌斯宾斯基沉思起来，接着，用两个手指指着开开的房门和门后墙壁之间的空隙处，说：

“您朝这里看看……这扇门背后能摆得下许多东西吗？”

“当然摆不下多少，”我回答，一时还不明白他这思想转移的关键。

“一双套鞋……”

“差不多吧。”

“可以肯定说，只能摆一双套鞋。不能再多了……”

他突然把脸转向我，兴奋地接着说：

“可是他往这里塞了那么多……人间的痛苦，悲哀……人的卑劣行为……简直需要四所石造的房子才装得下。”

我不禁笑了起来。以后，我又曾不止一次地看到乌斯宾斯基这种惊人的本领：他只要三言两语，或者列举眼前的事例，就能解释或阐明复杂的现象，要是换了别人，那就需要长篇大论、千言万语了……他的意见往往是简短生动的，能击中现象的本质，又常常从意想不到的方面来阐明现象。而且在他的意见里，从来没有那种使人感到对事物漠不关心而一味卖弄聪明的轻浮的机智。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在上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中说出“痛苦”、“悲哀”、“人的卑劣行为”这些字眼时的面部表情。对他说来，这不是一些简单的概念，每一个字眼都在他那富有表